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宗教与历史的交叉点： 丝绸之路

王 欣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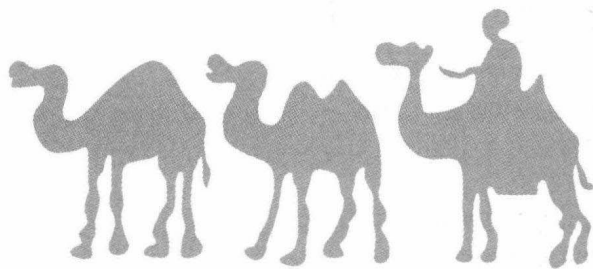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宗教与历史的交叉点：
丝绸之路

王 欣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伟洲

副主编 王 欣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宏	于志勇	马 强	王 欣
王启龙	方 铁	尹伟先	石 硕
厉 声	刘国防	李大龙	李范文
李 琪	杨圣敏	余太山	张 云
苗普生	罗 丰	周伟洲	哈宝玉
高永久	黄达远	韩中义	樊明方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总序

中国西部边疆地域广袤,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代丝绸之路贯穿其间,东西方四大文明荟萃于此,故近代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区域,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学术领域和“热门”学科,诸如藏学、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学、中亚学、丝路学等,代表并引领着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潮流,成为多种学科的活水源头。

历史上,西部边疆各族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成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在现今新形势之下,西部边疆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焕发了新的活力,边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进。然而,处于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在当今的新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系列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西部边疆地区面临中南亚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西方势力插手中南亚事务的意图越来越强烈,中南亚一些国家内部事务也日趋复杂化,民生问题、毒品问题、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突发事件频发。这也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边疆安全息息相关。又如,西部边疆地区大部分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不合理的开发极易造成环境的恶化;而西部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滞后,区域发展差距显著,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西部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总之,无论从边疆学及其他世界热门学科的继承和发展,或是从现实西部边疆面临的复杂局势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来看,西部边疆研究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有鉴于此,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将编辑出版《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是在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13年改名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创办的《西北民族研究丛书》改版之继续,基本保持原《丛书》的风貌及宗旨:以编辑出版那些探讨古今(特别是今天现实问题)与西部边疆(主要是西部新疆、西藏,兼及西部其他边疆地区)相关的学术专著为主,酌情收录有价值的资料汇集、译著等。由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审定选题、书稿及出版事宜,并面向全国(包括港台)及世界各国学术界征稿。我们仍然殷切希望本套《丛书》能得到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批评。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8月23日

目 录

在“宗教与历史的交叉点——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	甘 晖(1)
丝绸之路与东亚佛教	郑柄朝(3)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构	周伟洲(9)
丝绸之路:民族交融与文化发展的动力	李大龙(16)
《丝绸之路:民族交融与文化发展的动力》评议文	许南结(23)
简论西南丝绸之路	方 铁(24)
《简论西南丝绸之路》评议文	黄淳壹(37)
20 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	罗 群(38)
《20 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评议文	郭 磊(57)
试论丝绸之路的宗教传播流向	王 超(59)
《试论丝绸之路的宗教传播流向》评议文	崔恩英(67)
以《贤劫经》为基础的早期西域佛教修行体系的考察	韩枝延(69)
《以〈贤劫经〉为基础的早期西域佛教修行体系的考察》评 议文	王 欣(83)
从印度到中国般若信仰的交通路:丝绸之路	崔恩英(84)
《从印度到中国般若信仰的交通路:丝绸之路》评议文 ..	罗 群(100)
《华严经》的编撰和流通与和田	石吉岩(101)
《〈华严经〉的编撰和流通与和田》评议文	方 铁(113)
高昌名僧辑考	王 欣(114)
《高昌名僧辑考》评议文	叔坦俊(124)

丝绸之路上的胡商粟特人再考	许南结(125)
《丝绸之路上的胡商粟特人再考》评议文	韩 香(139)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译经僧在内地的活动	韩 香(141)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译经僧在内地的活动》评议文	郑广薰(157)
凉州、平城与佛教	吴洪琳(158)
《凉州、平城与佛教》评议文	朴光哲(166)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字资料与韩国古代木简、文书的比较 研究	尹善泰(168)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字资料与韩国古代木简、文书的比较 研究》评议文	李大龙(190)
韩国岭南大学所藏敦煌经卷《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和高丽 大藏经的对照研究	郑广薰(192)
《韩国岭南大学所藏敦煌经卷〈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和高 丽大藏经的对照研究》评议文	韩中义(202)
中古时期阿拉伯、波斯与中国应用麝香的比较	杨东宇(203)
《中古时期阿拉伯、波斯与中国应用麝香的比较》评议文	洪性楚(218)
韩国佛教医学的传来以及医僧相关活动之考察	金星顺(219)
《韩国佛教医学的传来以及医僧相关活动之考察》评议文	杨东宇(232)
丝绸之路上的近现代苏非派多维度考察	韩中义(234)
《丝绸之路上的近现代苏非派多维度考察》评议文	尹善泰(247)
甘肃省泾川县西王母石窟的夜叉像	黄淳壹(248)
《甘肃省泾川县西王母石窟的夜叉像》评议文	吴洪琳(264)
历史与宗教的交叉点—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苏文彪(265)
后记	编 者(271)

在“宗教与历史的交叉点——丝绸之路”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甘 晖

(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尊敬的郑柄朝校长,各位专家、学者,与会代表:

大家上午好!

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国金刚大学联合主办的“宗教与历史的交叉点——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两校的精心筹备,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陕西师范大学向出席今天国际会议的韩国朋友以及各位专家、学者和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家此次来到古都西安,研讨丝绸之路辉煌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首先我想说的是,这次会议选择了一个好地方。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联系古代东西方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大动脉,推动了东西方全方位、多层次的接触、碰撞、激荡、交流与融合,对彼此的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纵横万里的丝绸之路,已成为一条绵延不绝的开放、文明、对话、和平之路,经由丝绸之路而发生的文化交流,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常常令全世界为之惊叹。这次会议也选择了一个好时间,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一倡议,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是建立在文明融合与包容的基础上,着眼于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能够使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而且不同文明的相互砥砺与相互触进,能够产生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可以为世界不同文化的继承者提供对话与共同进步的平台。陕西师范大学在此愿做出新的努力。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在70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现已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一流师范大学,为国

家,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我校地处丝绸之路的起点,非常重视中外文化交流、西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民族与宗教问题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组建有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研究院已经初具规模,并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

作为此次会议主办方之一的韩国金刚大学,自1973年建校以来,在“少数精英教育”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取得显著发展成就,为韩国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陕西师范大学与金刚大学有着良好交流合作关系,早在10年前,金刚大学韩枝延教授就到我校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作访问研究,从此拉开了两校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帷幕。10年间,两校交往频繁,特别是郑柄朝教授担纲金刚大学校长后,两校的交流与合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签订了多层次的合作协议,并围绕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交流展开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说:“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未来几天,各位专家学者将就“宗教与历史的交叉点——丝绸之路”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将就共同关心的话题畅所欲言、坦诚交流,探索学术之出,体味学术之乐。我相信,这次会议对于推动丝绸之路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将进一步促进丝路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与学术文化交流,为新丝绸之路的复兴繁荣发挥文化的独特作用。作为东道主,我们在做好学术研讨组织工作的同时,还将竭诚为各位代表做好服务工作,让大家在古城西安、在陕西师范大学度过美好、愉快的时光!

最后,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2014年3月21日

丝绸之路与东亚佛教

郑柄朝

(韩国金刚大学 校长)

—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是很多民族赖以生存和角逐的重要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遗物,我们可以看出多民族历史发展之悠久。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点点形成的绿洲为中心形成了小国寡民的多个绿洲国家,因此,抑制了统一的部落国家的形成。所以不能简单地认知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及其历史。而且在其悠久的历史里存在多民族多样式的生活方式。北面沿天山形成天山南路上的国家与塔克拉玛干和昆仑山脉所形成的沙漠南路的国家有着非常不同的环境,从而形成了多样的生存方式。依靠天山雪融化成的江水生活的库车,利用昆仑山雪生活的于阗都与其他地区的农业国具有不同的自然环境。除了以贫瘠为背景生存下来各民族为单位的部落国家利用自然的方式以外,他们寻找到的生存方式,这正是“东西交流的使者”的角色。

早期东西交流始于亚历山大大王进攻印度大陆以后,开始了丝绸与矿物类等物质性交流。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是连接欧洲与中国主要的陆路,随着时代的变迁,就形成了多样的丝绸之路贸易。在商品的移动过程中,包括西北印度在内的丝绸之路的所有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就这样强盛起来,很自然地要侵犯到印度或中国的利益,因此用怎样的方法来控制沙漠绿洲国家就是中国历代王朝面临的大问题。为了确保安定的贸易之路,必须要控制这些丝绸之路上的沙漠绿洲诸国。由于丝绸之路各国培养了翻译官,日后,中国的大部分译经僧就来自丝绸之路上的各国。

从贵霜(Kushan)王朝时代制造的金币上,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贸易的痕迹。通过贸易商从希腊获得的金币被贵霜王朝再制造而得以通用,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宗教以及文化和商品方面的初步交流。贵霜王朝时期通用的货币上印刻着当时统治西北印度国王的头像和这一地域多个宗教的主神,其中也出现了佛像。这是佛像的首次亮相,其文化上的意义

是重大的。如果说补充其意义,主要是随着货币的国际通用,就实现了文化及宗教的传播与交流。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起点是商品交流,而宗教及文化的传播靠此来实现。东西方交流的传播速度逐渐加快之后就不仅是物质性交流了更是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佛教被很快的传播,成长为丝绸之路各国的国教。丝绸之路各国的佛教当然与印度或中国等农耕地区的风格明显不同。沙漠绿洲诸国在外敌的侵入要守护自己,却无法料知明日在极端的状况下就皈依了佛教,因而其具有较多祈福、现世中心性的特征。

财富积累不仅对沙漠绿洲诸国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经济富饶也造成了周边游牧部落对丝绸之路上的沙漠绿洲诸国激起了占领的野心。这些现象只用“贸易中心”或“东西交通要地”这一种原因无法全面说明。这是始于人类一直拥有对异文化的强烈好奇心,而且有某种原始欲望导致其更快地吸收这些异文化。

二

佛教是印度社会诞生的精神文化产物。换句话说,佛教是具有印度文化的背景生长出来的宗教,也是印度人崇拜佛陀的宗教。但是印度与东亚的国家、宗教观念两者有悬殊的差距。在印度的四姓阶层只有婆罗门被称作上位阶层,比起这神职人员,东亚的最高位置是从天上而降的皇帝。印度的最高位是出世间的圣人,而在中国是世俗性权力。像这根本性概念的差异在中国早期佛教史展开过程当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问题,代表性的例如《沙门不敬王者论》采用或道家、神仙术等重新解释了佛教的模样。“皇帝即如来”思想,在印度社会甚至不敢想象,而这种中国特色的佛教是以中国原有的思想和宗教来解释佛教的结果,或是国家统治者存在不同的概念而产生的现象。如这样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是从佛教传入早期至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的。

不仅中国如此,韩国接受佛教过程也十分曲折。殉教是从外来宗教的佛教与本地土著宗教的极端对立的角度来能解释的。佛教在东亚被接受后,与本地的思想及宗教一直持续着冲突。随着佛教教团内部的变化,固有的文化与习俗的本土化彻底彰显。因为佛教是排斥权威主义,所以就易融合了当地的文化。日本的神道、韩国的山岳崇拜等都是佛教土著化的代表性实例。尽管如此,佛教进出并深入东亚世界的过程当中,“丝绸之路”的地

域、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力很大。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存在实现了佛教的东传。

丝绸之路的古代国家其早期文化大部分受印度影响很大,言语方面为印度梵语的方言,即 Kharosthī 被相当数量的国家使用。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于阗可能是塔克西拉(Taxila)的移民。随着丝绸之路各绿洲国家的建立,能够推定其与印度拥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但是其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具有与印度不同之处。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在被融入以及发展过程中绿洲诸国政府的介入,使佛教能够深深地扎根落户。

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佛教国教化以后,在于阗国王直接全程参与了四月初八佛诞日的庆祝活动,把城内所有事务全部搁置,一切以侍奉佛像为先。随之产生的开支全部由国家承担,国王是庆典活动的总指挥。从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对于每五年举行一次的般遮越师,也建立起了一套由国家统筹并承担一切费用的模式。通过于阗佛教的情况,特别是财政由国家支持的形态的建立,以及古印度阿育王的护佛政策和类似的情形,这可以看出佛教的发展过程。即丝绸之路的佛教与印度佛教思想相比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相比,更偏向于神秘、咒术的特性。因此仪式主义(Ritualism)泛滥,这也是这种全国性的庆典只能由王来主导的原因。

与通过“支援”角度的国家介入不同,也有的国家通过“管制”的角度进行介入佛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龟兹佛教的发展史。佛教传入以后,龟兹女性出家变得相对自由了。在龟兹可以看到尼姑寺院的主持师太同时掌管着尼姑界发展和尼姑寺院运营的模式。而且尼姑寺院主持师太是被龟兹国赋予的管理权和地位。这样的形式,与中国北魏时期初次实行的僧官制相比,足足早了 100 多年。实际上,印度的佛教除了阿育王时期以外,其他时期采取的是彻底的政教分离制度。但是,在中国却存在着极端的护佛和排佛现象。特别是随着帝王的佛教观的不同,国家对佛教的态度千差万别。僧官制,或僧正制,在印度社会中并不存在,只是东亚佛教的特性中的一点。这种制度里面蕴含着宗教就在国家及社会制度下存在的观念,而印度的四姓阶级体制下家教权力属于婆罗门种姓,其他三种性没有宗教特权。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佛教传入的桥梁,还在佛教思想、文化、制度等扎根落户于新环境的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三

如今东亚佛教代表思想和文化非常之多。担当着东亚思想结构核心的

佛教是北传大乘佛教。与之相对应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北传大乘佛教的代表是般若、净土和如来藏(佛性)思想等。公元6世纪之后飞速发展的中国禅宗也是在与上座佛教的传统完全不同的脉络中进行发展的。禅宗至少很难在现今的南方上座部佛教中找寻得到。

起初,中国佛教并不是清一色的大乘佛教。但以佛教生根落地的公元3世纪后半期为起点,中国佛教开始迅猛的大乘化。大乘化初期的核心人物是鸠摩罗什。他就是汉译佛典的分水岭式的代表人物。

鸠摩罗什出生于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国,9岁时为了学习小乘的杂藏和阿含而离开家乡,12岁时回到龟兹国后在疏勒学习阿毘达摩,又在龟兹国学习《十诵律》、《中论》等。小乘的“说一切有部”学说在当时的龟兹国特别流行,因此鸠摩罗什在学习佛教过程中更倾向于小乘。前秦的皇帝苻坚希望迎请到鸠摩罗什,但鸠摩罗什正式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时候,苻坚已经死去。鸠摩罗什在中国的活动是以翻译大乘佛典为中心的。

著名的译经三藏中有佛陀耶舍。他在中国翻译了《四分律》和《长阿含》等,是所谓小乘经典和小乘律藏。但是他离开中原回罽宾国后,找到一卷大乘经典,即《虚空藏经》送给凉州的僧侣们。(慧皎,《高僧传》卷第二)

通过译经僧侣和传法僧侣们的事例,达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之前学习了小乘,但是来到中国后更多的翻译了大乘佛法。相反,中国内地僧侣经过丝绸之路各国以及印度的求法旅行主要是为了找到更多的大乘经典。从于阗带回的《华严经》梵本的支法领是中国最初念佛结社的领导、主张“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庐山慧达的弟子。支法领不仅带来《华严经》的梵本,而且还带多种禅经的梵本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由鸠摩罗什翻译的。

昙无讖出生于中天竺,经过罽宾和龟兹到了敦煌,在敦煌期间首先翻译了一本《菩萨戒本》。然后到凉州翻译了《涅槃经》。他在翻译初分的10卷时发现《涅槃经》的品数不全,要回到天竺再找补足的经文。其后从天竺回来时,在于阗找到了部分的经文,回凉州进行了翻译。昙无讖再次派人去于阗找到后来翻译,最终于421年完成了《涅槃经》共计36卷本的汉译本。

以上介绍的故事当中有两个不能忽视的方面。第一,传法僧侣们虽然在印度学习了小乘佛法,但是他们来到中国以后的主要精力却是对大乘佛法的翻译。第二,为了大乘佛法不足的部分进行了补充,不仅中国的求法僧而且印度的传法僧也在丝绸之路周边的西域各地努力求找经本。4世纪中后期至5世纪前半期,中国佛教的大乘化得到巩固与发展。西域的传法僧们

想传达的佛法与来到中国后实际翻译的佛法内容却不同。我还不确定这是否与当时中国佛教的倾向或时尚有关。但这是佛教的原籍印度出身的三藏们也不可违拗的顺应潮流。西域的佛教诸国对这些潮流更加敏感。因为从中国过来的很多求法僧们都寻找大乘经论,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反应。西域诸国的佛教渐渐的从小乘为主转向大小乘兼学转变,然后又从大小乘兼学再次转变为以大乘为主,这就是那种反应的结果。

这些转变单纯的看好像是很自然的变化,但是处于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与中国这两大文明圈之间的西域诸国的立场来看,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

西域诸国把中国佛教界的变化主动传达给印度佛教界,同时从印度佛教那里主动选择中国佛教界所需要的。随着中国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力提高,西域诸国也很敏感地发现这种形势的变化,也都不以被动的立场而以主动的立场接受了,因此中国佛教很可能在5世纪以后更加加速进行大乘化。

当今,北传大乘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这种公式化的分类里存在西域诸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回应。丝绸之路的佛教不仅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交流搭起了便桥,更对中国佛教具有莫大影响。

四

和前面已经谈到的一样,过去丝绸之路以物质的交流为基础进行宗教和文化的传播,存在吸收后又再逆方向传播的循环。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繁乱历史性一个地方。过去的天竺,它的西北面的尽头是印度河的上流,是一个艰险的溪谷地带。过去的中国西部是以敦煌为边界的。把印度河溪谷的半山腰常年积雪作为水源地不是绿洲的绿洲,那里有不是路的路,有时能连接那些绿洲,有时又断开的。以敦煌为起点一直到喀什的路都是沙漠。沿着沙漠的边缘走,是形成的一些稀稀拉拉的绿洲连成的死亡之路,这两条路是在帕米尔高原的西部,连接着天竺和中国。由星星点点的似岛非岛的绿洲连接起来的线就是丝绸之路。

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向中国传播,终于创造了东亚佛教的思想和文化潮流。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不是受到印度佛教的直接影响而形成。当然,有时不经过天竺和中国而直接到达东亚的佛教偶尔也是有可能的。就像以韩国南部龟浦为中心传播的首露王和印度许王后的结婚记事。这虽然是被新罗合并的伽耶的建国神话,但是作为南方佛教传来说的启示点来

说也是很有趣的。然而这些传说仍然在历史上不能被认可。

大部分佛教经过一个又一个的绿洲达到中国的西部,部分经过长期的航海期间内有时在停泊地滞留很久,从而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或者依据当地文化经过变通过程的转变。经过这种变化以后到达中国的这些印度佛教,可以说发源于印度,也可以说发源于海上诸国。

路不只是从一侧的末端连接另一侧的末端,当然也具有逆方向连接的某种循环的构造。文化不是一个方向传播而是互相交流的。只限定说佛教这单一的宗教、思想、文化是不准确的。前面也提到过,从印度出发的佛教与到达中国的佛教,虽然同为佛教但又完全不同。印度人通过佛教追求的东西也不同,中国人通过佛教企望的东西也不同;相同道理,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通过佛教追求的东西也不同。三者交织,就孕育出了新的佛教。我们把它的名字称作东亚佛教。即:必须扬弃只在佛教与特定区域的文化内部寻找东亚佛教的已往见解。必须考虑佛教自身拥有的重叠性,而且传到中国、韩国之前已经历过的西域诸国佛教的影响。

个人的宗教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国家的宗教,阿罗汉的梦想被菩萨的梦想代替了。梦想不仅是个人的完善而且是共同体的完善,由共同体的完善来完善个人的梦想,不放置理想而在现实里体现理想,不是需要完善的众生而是将已经完善的佛性与佛祖的人间作为出发点,东亚佛教就应该这样来定位。

东亚佛教是从本土天竺出发,经历了丝绸之路的艰辛万苦、迂回曲折的变化后接触了东亚而相遇的新佛教。我们所探求东亚佛教的旅程不只限定在东亚佛教内部,还应当与给东亚佛教造成阵痛空间的丝绸之路一起并肩同行。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构

周伟洲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教授)

一、丝绸之路与中西方的贸易

古代丝绸之路,学者们对它有許多称誉:或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或称为“一条最伟大壮观的中西贸易商道”,“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或称为“欧亚两洲的动脉”,“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等等。事实上,丝绸之路的本质应是由贸易道路为标志,涵盖中西方地域的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民族迁徙、融合等方面交往的通道和桥梁。

丝绸之路(本文简称“丝路”)的本质是一条欧亚贸易的通道,故其首要的功能,即是起到一个贸易桥梁的作用,其内涵主要是商业贸易。自丝路开通,中国内地与中亚、欧洲、南亚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其主要商品是丝绸,有时丝绸甚至作为贸易等价物的货币使用。公元初,中国丝绸经过丝路主要运销至欧洲罗马帝国和中亚的波斯等国。查尔斯著《世界史纲》说:“罗马帝国安敦时代(161-180年),须经道运迂回之路程,才能运抵罗马的丝,其价值高于黄金,然罗马人姿竟妄用”。公元3世纪,“丝绸成了决定拜占庭帝国各项政策的一种重要因素”(布尔努瓦《丝绸之路》)。

波斯等中亚各国也不断派遣使臣至中国,他们自汉代以来就成为中国丝绸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一位法国作家西尔瓦说:“丝绸贸易主要被波斯人操纵着,他们一手经营这一生意,与希腊、埃及人展开贸易。当时,通往西方的道路,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都被波斯人封锁着。当时西方人称中国为丝国(Sere),他们还以为丝是植物生的呢!很久之后,罗马商船才得以运航至中国,并在印度支那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其次,还有其他许多商品在丝路上流通。如中国销往西方的商品,除丝绸之外,还有铁器、粮食(谷子、高粱、水稻等)、漆器、瓷器、茶、药材(麝香、大黄、樟脑、肉桂、姜黄、生姜)等。由西方来的商品,有马匹(如大宛马等)、农作物(苜蓿、菠菜、甘蔗、葡萄、胡桃、胡麻等)、金银器、玉器、各种毛织品、珍

宝、香料、玻璃器、畜产品等。

丝路贸易的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是多种多样的。最明显和见于记载最多的是“朝贡”的形式。中国正史记载的西域、中亚、欧洲、南亚(印度等)各政权和民族向中国各代政权朝贡的记录,不计其数。当然,史籍所载中亚、西亚及罗马、埃及、印度等遣使的记载是不完整的。而这些使臣也不一定是其国所派遣,而是打着本国的旗号而来的。他们朝贡的目的,有的具有政治的原因(联盟、和亲等),但更多的是经济因素。他们的将本国或邻近国家的特产、珍奇物品,向中国朝贡,换回了以丝绸为主的大量赏赐,其价值往往超过其所贡物品。这种情况在史籍上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在唐代以后,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到明清时,内地王朝多有限定西域各国朝贡来的时间和人数的诏令。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国朝贡使团的贸易性质,还可从使团本身带有大批商人或商团,沿途贸易上表现出来。如西魏时,凉州刺史史宁曾在凉州西赤泉截获了一个使北齐的吐谷浑使团,内就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周书·吐谷浑传》)。因此,朝贡是丝路上贸易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

不仅如此,在古代中国与西域及漠北、中亚等国家和民族的其他形式政治交往中,也多含有贸易的性质。比如“和亲”,有的研究者提出,也是一种“聘赐贸易”。其次,丝路上的贸易形式,因路程的艰险和遥远,那些相离很远的中亚、欧洲、印度等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大量的贸易还是通过丝路上游牧民族的转手或中继的贸易形式,才得以实现的。中国的丝绸实际上大量是通过漠北和中亚游牧民族或中亚粟特商人而转运的。漠北的匈奴、突厥、回鹘、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吐蕃及新疆各族等,他们均先后充当了丝路贸易的桥梁和中继者的角色。

当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方式最主要的、大量的,还是各国商人们往来于丝路上的贸易,关于此文献直接记载不多。但从间接的资料可以窥之。如在丝路要冲和最大的市场之一的高昌,曾出土了大批唐代的文书(称“吐鲁番文书”),内记载了西州市场上贸易的情况。如出土的《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是一份西州市司上郡仓曹司对市场各种商品估价的文书,内对丝绸品、布匹之类的商品的记载颇多,甚至注明了产地,有“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绢”、“蒲、陕州绢”、“常州布”、“益州半臂绢”等。丝路上一些重镇和市场,往来的中亚胡商的内地商人是很多的,反映出丝路上民间贸易的深